

纵横之变

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历史哲学

杨利川 著

上海三联书店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Vertical Society to Horizontal Society





纵横之变

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历史哲学

杨利川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横之变: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历史哲学/杨利川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ISBN 978 - 7 - 5426 - 5058 - 0

I. ①纵… II. ①杨… III. 东西文化—研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709 号

纵横之变——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历史哲学

著 者 杨利川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王业龙 尹 璐

策 划 圣大燕园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 1020 1/16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18.25

书 号 ISBN 978 - 7 - 5426 - 5058 - 0/B · 390

定 价 48.00 元

每个时代所给与人类的，并经常被人忽视的教训是：表面上似乎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直接利益相去甚远的思辨哲学，其实是世界上最能影响人们的东西。从长远看，除了它自己也必须接受的影响以外，它可以克服一切影响。

——J. S. 穆勒 1838 年

前 言



问题的提起——未完成的思想启蒙——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重建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1 问题的提起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搅动了全世界。9月15日,有百年辉煌历史的雷曼兄弟率先破产,金融地产等机构如多米诺骨牌似的连串倒下。紧随其后,欧洲各国政府债务发生危机。这些,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遭到质疑。

但是,转到地球的另一面,似乎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加入WTO才七年的中国,不仅已跃居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两年后就跃居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而且已经“富”得到处伸出援手,解救世界了。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曾使美国学者福山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认为民主制度将是世界各国未来的共同方向;可是,话音落下不过十年,“911”事件却标志着“文明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而中国,似乎给出了另一个榜样。

在全球化背景下,危机谁也不能幸免。但中国在“政府号”火车头的

带领下,投资热度与流动性一样充足。不仅中国政府大量购买美债、欧债、日债,而且从官员、商人到百姓,纷纷向欧洲、澳洲、北美洲以及叫不上名的撮尔岛国移民和投资,扫货的中国游客们表现出的轻狂之气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一时间,“中国不高兴”“中国统治世界”“北京说了算”成了流行语。与此同时,“东方智慧”凸显出其时代价值,传统的中国儒家的和谐中庸理念独树一帜,和平主义的天下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下为公的社会观被人们看作新世界的哲学,它们不仅是支撑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也是解救西方世界与和解文明冲突的药方。

然而,另一种声音更加强劲: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政府主导下的粗放型增长,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资源浪费、生态危机、贫富分化、官场腐败、人权贬损、社会冲突……当公权力绝对强大时,就形成一个黑洞,将所有资源包括良知都一并吸入,整个社会都扭曲了。但是,看起来,“中国模式”却风头未减,更加雄心勃勃。

百年来饱受欺凌的中国人终于可以揣着鼓鼓的钱包走向世界了:开矿山、修水库、建电站、挖石油、铺铁路、盖大楼,从南亚、外蒙、中东、非洲到南美,到处都有中国开发商的身影,甚至可以到欧美腹地攻城略地了。当然,还有采金、捕鱼、做生意的民间“水军”。

我们就是这样走向世界的。

但是,当我们像一头大象出现在世界面前时,迎面而来的却并不都是鲜花。中国人四处出击,从近海到远海到外海,从矿产到木材到鱼翅,从LV到法拉利到比华利山庄,中国人超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让全世界都感到紧张不安。无论是商人、劳工还是渔民,常常因“非法贸易”“非法捕捞”“非法采矿”等罪名遭到排斥、拘捕甚至枪杀,这不仅发生在俄罗斯、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帕劳、加纳等地,甚至老牌西欧帝国西班牙警方也对“中国黑帮”采取了拘捕行动。即使那些企图海外求学的高材生们,居然也有50%以上的人对分数、学历、公益经历、财产、社会

关系等施以高超的作假技巧,令哈佛等名校的招生人员对中国人的无所畏惧大开眼界。

中国,这个三十年前还在刚刚打开的世界之窗面前惊讶不已的国家,现在,已经越来越引起世界的惊讶了。

这就是21世纪的中国。一边是“中国模式”带领的经济奇迹,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独领风骚,一边却悄然露出对外部世界“水土不服”的病态。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没有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反而到处遇到麻烦,愈加暴露“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的软肋。我们不禁疑惑:难道我们还没有购买走向世界的门票?

近年来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内政与外交的不可分割性,也即治国理念与普世价值的不可分割性。在全球化语境下,核心价值理念将在无形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随着政府的日益强大,社会却在日益堕落;管制越严厉,大众越散漫;资源越垄断,政府越像开发商;公权力越强大,国民们越显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无能。一边是义和团式的爱国主义宣泄,另一边却看到“节日垃圾”从全国各大景区经过条条高速公路一直铺到天安门广场。不仅官场腐败成为不治之症,民风也深受污染,以撒谎造假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风气几乎成为民族性格。

这是文化问题,还是体制所致?是古老的传统,还是今日的弊端?

中国,这个久已盼望走向世界的国家,当它今天真正跨进世界门槛的时候,却不知所措了——是世界不欢迎新的客人,还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异样?

2 未完成的思想启蒙

纵观大历史,也许再也没有比当下的世界乱局使人类更加困惑的了。

如果从林则徐继而魏源编纂《四洲志》和《海国图志》算起，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已经有170余年了。当国门初开，西风渐入，国人在巨大冲击中感到了惊异、恐惧、新奇、欣喜……总之，他们见到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东西——

首先是洋人送进宫里的礼物，如音乐钟表一类的“奇技淫巧”，后来在战争中才看到坚船利炮，而其身后是纺织机和蒸汽机代表的工业革命，以及大机器生产的“洋布”“洋面”“洋火”。有过出使留洋等经验后，才真正打开眼界，原来西方世界竟是如此物质丰富，技术先进，从而看到了世上还有工业化和城市化。

经过更深入地观察国人才明白，支撑这一切的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私人产权、证券交易所、公司与银行……更加扑朔迷离的，是遍布城乡的各式教堂，广场上的雕塑与教堂穹顶上的绘画，以及多少年来，国人都难以解释的西方人那执著如生命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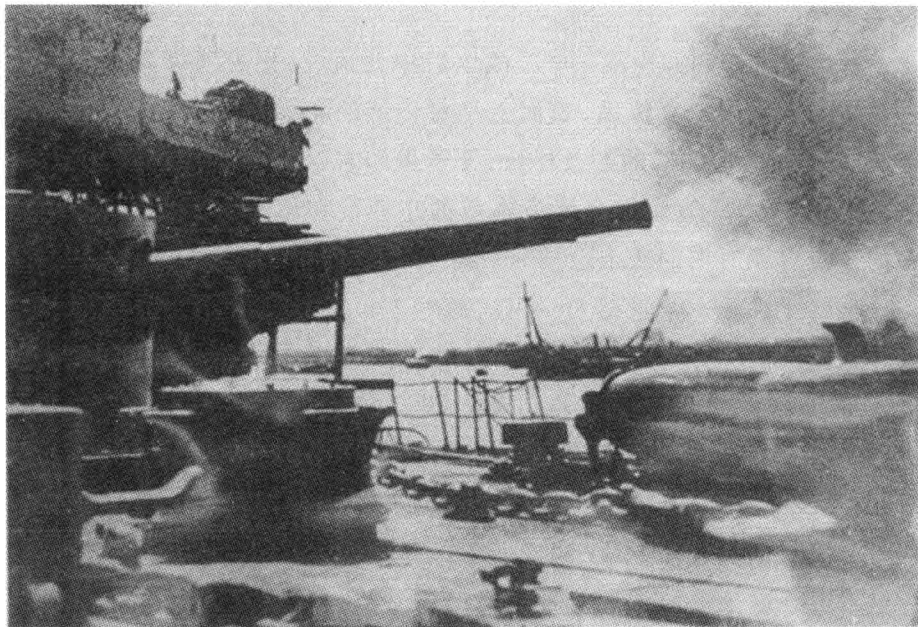
当进入到文化和政治领域，我们的前辈半是热恋半是敬畏地仰望着包括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契约在内的理论体系。当然，还有那完全有悖于中国道德的个人主义、男女平等、性的开放。如果不是经过国际交往和大事件，就更不知道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霸权和殖民主义政策，并且从中知道了主权国家、社会进步、现代化、国际秩序与国际竞争等新概念，知道了外交、谈判与国际贸易等新事物。

当国人艳羡西方的发达和文明的同时，也看到了事情的多面性，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掠夺和屠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几十年间连续两次爆发的世界大战。

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对于如何看待世界，如何接纳世界，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影响世界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不同的世界格局，不同的国内局势，都会激起国人的民族情绪和世界观念，从而引起对东西方文化优劣的深深思考。

不言而喻,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审视,是在开放带来的比较中进行的。

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议会政治、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共执政前后两个三十年若干历史背景中走过,各种论述如白云苍狗,变幻无穷。有过对传统文化最激烈最痛快淋漓的批判,有过对国粹最审美最哀怨的挽歌,也有过开始激进批判而后又归于守旧的摇摆反复,也有对东方智慧最殷切的期待。可见,在走向未来的征途中,中国文化的浴火和涅槃是多么的艰难!



鸦片战争

170 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引起较大冲击的时期,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晚清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惨败,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从新奇到屈辱,面对着强烈的心理冲击,变革图新和坚守祖制血腥博弈,中

国一边挨打一边被赶到世界历史之中。

五四运动——辛亥后的摸索与挣扎，军阀混战、贿选、复辟、暗杀、袁氏登基、二次革命。鲁迅说：“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中国尚未看准方向，西方却掀起了世界大战，西方世界的问题令国人对新学产生怀疑。战后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正可谓歧路纷争。反思、批判、激进相互交织。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对传统文化剖析最深刻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大师级的启蒙思想家，也是百年来思想最自由的时期，是不可否认的启蒙时代。但是，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这次启蒙运动在救亡大潮下被淹没了。

社会主义高潮和冷战——二战以后中共执政，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和党国教育体系，表面上是对传统的粗暴践踏和彻底抛弃，实际上却是“道德治国”的经典样板，骨子里印着“内圣外王”“大公无私”“存天理灭人欲”等儒家传统最本质的东西。在不断的政治整肃下，仅存的一点启蒙时期的残余也被一扫而光了。

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面对十年“文革”浩劫和历次政治运动，全社会都在期盼改革开放，随着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世界的憧憬，中国进入继“五四”之后又一个新启蒙时代。人道主义、民主宪政、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科学哲学、存在主义、新技术革命浪潮……其中，关于“传统与变革”、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超稳定结构”、关于“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关于“中国为什么缺乏民主传统”等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曾几何时，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当历史跨过那春夏之交，思想的浪潮一度显得平静下来，躲到了岩石的背后。但经济快车不仅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在“政府号”火车头的带动下，越开越快了。相应的，这一次的启蒙运动，又被经济大潮所淹没了。话说到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这么难以持续完成？

中国崛起和世界经济危机——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次复杂的多了。中国并不是落后挨打，也不是闭关锁国。这一次，中国似乎是要拥抱世界了。但是，正像高速快车甩下的一系列国内问题一样，在国际上也照样遇到种种尴尬。

毫无疑问，当年面对世界时，古老的中国是被动开放的。而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对世界却有着从未有过的强势。但是，我们现在算是主动选择了吗？我们是否真的搞清楚了应当怎样进入世界？

21世纪以来，不仅中国，似乎整个世界都进入了胶着时代。全球化、“911”事件、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议。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有着一次又一次的发问。

东西方文明，究竟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怎样不同的评价？由此问道，人类有没有本原？有没有普遍史？有没有“应然”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展模式和文化形态？当然，历史不是单行道，但历史难道是没有方向的吗？人类经过多线式的发展，在多元化和差别化之后是否归于同一？如果归于同一，在形成普世文明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体制、文化还是族群心理？

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现代化，那么，什么是现代化进而现代性？有不同的现代性吗？现代性是西方性还是普世性？可以用相对性、多元性来反对普世性吗？或者干脆说，现代化与西方化是不是一回事？

在纷繁的争议中，甚至连什么是文明都模糊起来。什么科学、理性、进步，什么民主、法治、人权，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等等，都搞不清是什么了，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和非历史主义，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流行思潮，或者用多样性否定普适性，真是价值体系大错乱。

百年来的反复折腾、左右摇摆、重复提问，难免使我们焦躁不安。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究竟怎么了？它的发展难道就没有逻辑了吗？它的成长之源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

3 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在探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三个层面上进行的。

首先,我们想搞清,为什么百年来中国文化总是处在徘徊和困惑之中?其中,主要揭示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那些运行于社会潜层的传统意识,它将在什么条件下变化以及如何变化。

这个层次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历史逻辑是什么?

其次,在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解剖之时,世界格局似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中国模式”傲然于世界,而西方的衰落也显而易见,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甚至有了“中国解救世界”的呼声。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文明的冲突”?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这个层次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角色是什么?

最后,这不得不使我们进入更深的层次——更高的哲学视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关系,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碰撞,将产生什么后果。最终是想回答,在世界合流的大趋势中,东西方文化是如何融合的,各有哪些积极的贡献?

这个层次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文化史的归宿在哪里?

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一些人往往离开了历史的背景,较多的是采用概念诠释或例证枚举的方法,并与西方相似的概念或事件对应地作出解释,结果是并不能理解其真实含义,特别是不能解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实际作用,从而落于牵强附会的窠臼。

陈方正教授在其《继承与叛逆》一书中以极其翔实的资料加之深厚的哲学和文化功底,论证了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的问题,认为“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不在近代,而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或更早,比如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在世的‘轴心时代’”。但他仍然说,

这样一个命题恐怕永远不能得到“证明”。^①他又说，“但说到底，希腊之出现普罗米修斯和印度之出现佛陀、中国之出现孔子一样，恐怕都只能归结为广义的‘轴心文明’现象，至于其‘所以然’，则恐怕不是历史分析所能够充分解释、穷尽，或者化约成为更根本因素的了。”^②

所以，无论多少概念诠释和实例枚举都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绕开实证方法，而用历史哲学去作出“判断”呢？正如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普世价值的认可，而是论证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并不依赖于事件例证和概念诠释，而是根据逻辑推演得出必然的结论。

这也如陈方正先生所说：“当然，在今日的所谓‘后现代’时期寻找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所谓书写‘大历史’的企图被认为是非常可疑，乃至徒劳无功的，因为其结果总是时时处于被新证据、新发现或者新观点、新诠释所颠覆的危险之中。”^③但是，我们只有用哲学和大历史来追寻它们的本源和本质，才能避免脱离时代背景的假象和以偏概全、盲人摸象式的结论。

其实，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正如中国哲学本身一样，问题就是在于缺乏历史感，人们总是把诸如“道”“仁”“天人合一”等看作静态的、抽象的东西，极尽诠释以至猜测之能事。完全不同的是，在西方，哲学就是哲学史，没有历史，没有内在的逻辑，你就无法理解哲学概念。

当未来越是不确定时，我们就越是努力往回看，通过以往的足迹，来校正我们的路标，希望历史能够告诉未来；现实不清晰，也许是因为离得太近，只能看到偶然的、个别的事件，无法观察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就站得高一些，看得宏观一些，让大历史揭示事物的本质。

与那些寻章摘句和概念考证不同，我们的方法是将大家公认的历史

^① 参见陈方正：《继承与叛逆》，三联书店2009年版，自序。

^② 同上书，第603页。

^③ 同上书，导论第29页。

现象或已有的结论用崭新的框架和逻辑串起来,这样,原来的那些个别的历史现象和理论观点就有了更清晰的来龙去脉,从而看到更深刻的本质。

正如我们只有升得够高,才能俯瞰南美洲玛雅文化留下的神秘线条那样,如果没有更宽广的视野,如果没有纵观大历史的逻辑,哪能看清人类所走过的凌乱脚印构成了怎样的轨迹呢?

4 重建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金观涛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只有历史发展的逻辑得到科学理性的阐述,一个民族的心灵才能真正解放,历史的代价、悲哀、愤怒才能得到平息。从此,过去不再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它将成为后继者可以通过它最终超越历史的智慧之路。^①

这将是一次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重建,它不取决于主观的臆断或者好恶,而应让整个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真实的答案。

我们在错综复杂、纷纭万象的世界文化中讨论价值判断,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和源头,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如我们将要讨论的大农业时代地理环境的差异),他们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但是,毕竟他们都是人,当他们随着世界历史重新走到一起时,应该有着共同的归宿。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的讨论就无从谈起,任何结论都变成相对主义的诡辩,没有意义了。

因此,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共同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是?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和分化?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走

^① 金观涛:《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到一起？走到一起时是个什么样子？

1828年，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在谈到文明的定义时说到：“我们可以问，究竟它是不是一种普及全世界的事实，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一种人类的命运；各民族有没有一种世代相传的东西，它从未丧失而只会增加，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团块，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永远？就我而论，我深信，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命运，一种文明集合体的传递，因而存在着一种有待于撰写的、全世界普遍的文明史。”^①

尽管近年来有些观点批判所谓“历史直线论”，甚至堕入历史相对论和虚无主义，但我赞同基佐在186年前所持有的态度，相信不断走向美好是人类历史的大趋势。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那部近年来极有影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赞同人类历史是“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观受到各种强烈批评，但福山仍然借鉴他们的历史理论在说明，“人类社会是从建立在奴隶制和仅能维持生命的农业基础上的简单部落，先后经历各种神权政体、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统治，上升至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技术先导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连续的、朝着更多人有更大自由民主制度这一方向不断发展的人类历史”，福山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历史，也就成为“世界普遍史”。

这种证明的意义在于，“这个过程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②

总之，进步性、方向性、普遍性，是人类历史的特性。

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段子说，北京大学的门卫每遇到来访之人，总是

^①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2—5页。

问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可见，高深的哲学命题与日常生活琐事是息息相关的。是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是它的特质和发展逻辑？

只有哲学和大历史的方法，才能够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令人困惑的历史性悖论：

如果说，中国人信奉的是“天下为公”，崇尚集体主义，那么，为什么却最缺乏公共精神，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善于合作，不守规则，被形容为“一盘散沙”？

如果说，中国自古自来自诩为道德大国，礼仪之邦，相信人性本善，但为什么最终走向虚伪，造假成风，虽然推崇道义至上，到头来却最看重物质和金钱，缺乏精神生活、艺术气质和宗教信仰？

如果说，自从三皇五帝至今，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种族、文化、主要生活区域都一脉传承，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最古老最独立的文明，可谓历史最悠久，那为什么总是习惯于否定过去，不断革命，只有循环往复的“轮回”，没有恒久的遗产和持续的进步，被黑格尔喻为“非历史的历史”？甚至难以找到几家产权明确的百年老店、百年老房？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守望自然生态，崇尚勤劳节俭，那么，为什么其生活方式的结果却最能消耗资源？如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请客送礼与婚丧嫁娶的铺张浪费、对公共资源的无序掠夺，自古至今上演着一幕幕最疯狂的“公地悲剧”，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而缺少精神生活？

我相信，这些问题正是困扰着我们上百年的文化焦虑。随着全球化的到来，随着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崛起，随着我们主动迎接再一次的启蒙运动，这些问题到了最后解决的时候了。

当然，换一个角度，如果说，中国的古老文明长期停滞，只是农业时代的反映，那么，为什么西方社会自19世纪以来，从叔本华、尼采等人开始，以及之后诸多哲学家、科学家的思想中都带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并掀

起了东方主义思潮也即对中国哲学持续的关注？

中国人一向缺乏理性思维（其原因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何况当今之世思辨已不流行，但仍请读者耐心跟着我的论证一环一环地走下去，直到我们的问题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那把钥匙。